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 民族志丛书
何明◎主编

花腰彝的生活

——云南石屏麻栗树村60年变迁调查

谷家荣 余晓莹◎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花腰彝的生活

——云南石屏麻栗树村60年变迁调查

谷家荣 余晓莹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腰彝的生活:云南石屏麻栗树村60年变迁调查 /
谷家荣,余晓莹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22-06884-1

I. ①花… II. ①谷… ②余… III. ①彝族—民族志—石屏县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9024号

责任编辑:朱海涛

装帧设计:马 滨

责任印制:洪中丽

花腰彝的生活——云南石屏麻栗树村60年变迁调查
谷家荣 余晓莹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884-1
定 价 36.00元

继承“魁阁”传统 推动民族志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民族志丛书》总序

何 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民族志”（ethnography）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写作的文本；其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①。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而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的产物。

民族志是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术生产的核心产品。在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领域，民族志被视为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的分野，前者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或“书斋里的人类学”：学者们不从事系统的田野工作，其学术成果也不是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表达，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资料来源大都是旅行家、传教士、殖民者、船员等曾目睹过异文化的人士所撰写的文字资料和历史档案文献，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不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不撰写系统的民族志。从19世纪末起，文化人类学开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其标志便是英国动物

①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19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学家兼人类学家哈登 (Alfred Cort Haddon) 在1898—1899年两次率领剑桥大学的考察队赴托雷斯海峡进行田野调查并完成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和英国功能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马林诺斯基 (B.K.Malinowski) 通过1914—1918年之间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所撰写的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此后, 民族志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必不可少的核心性工作, 并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学术范式。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它将先前主要由业余学者或其他人员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的资料搜集活动以及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实践”^①。在现代学科体系中, 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通常被视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方法特质, 尽管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经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发明并规范之后被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众多学科所援用, 但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当作不可或缺的学术实践, 也未能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建构了如此系统的田野工作范式和完成了如此之多的民族志经典文本。

民族志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关键。社会文化的描述与理论解释是民族志缺一不可的要素。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自己对花篮瑶和江村的两次调查时深刻地指出: “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 所得的材料是零星的, 没有意义的。我虽然在这一堆材料中, 片断地缀成一书, 但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 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成在一个

① [美] 乔治·E. 马尔库斯、米开尔·M.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王铭铭、蓝达居译, 第39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①只有抽象理论论证而没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资料的学术文本，是“演绎理性”的理论论著，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令人信服的有价值的民族志；只有社会文化资料的排列堆砌而无周密系统的思想观点或理论解释的文本，只能视为“调查资料”，最多称之为“田野报告”，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具有学术创新意义上的民族志。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互动理论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每一次学术流派的更迭创新，都是围绕着民族志展开的。没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翅》等民族志，就没有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云南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曾经是中国组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学术实践的重要机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吴文藻先生在40年代初与燕京大学合作创办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研究室（因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到昆明近郊呈贡县魁星阁而被称为“魁阁”）。“魁阁”组织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撰写工作，完成了《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著）、《祖荫下》（许烺光著）、《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著）等一批中国早期民族志研究的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鼎盛时期。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迄今未能撰写出“魁阁”时代那样得到学界认同和广泛影响的民族志作品，这既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滞后的表征，也是学界对民族志研究重视程度不足的结果。有感于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于2008年4月恢复与重建“魁阁”研究室，旨在弘扬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家、民

①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族学家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实地研究传统，以民族志的学术生产为龙头，全面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创新和学科建设。在“西南边疆研究书系”专门设置“民族志丛书”，遴选出一部分选题具有较高价值、田野调查深入细致、理论阐述较为完整、撰写较为规范的部分成果纳入其中出版，便是这一学科建设理念的具体行动。

当然，学术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优秀的民族志也不可能呼之即来。纳入“民族志丛书”的作品，是有志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努力的结果，能否被学界和社会认可，既需要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时间的检验。

我们对于“魁阁”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第一章 导论 / 001

第一节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村庄 / 002

第二节 村庄变迁研究理路 / 016

第三节 新乡土本色：村与非村 / 026

第四节 走在乡土上 / 035

第二章 麻栗树 / 041

第一节 行政区划 / 042

第二节 花腰族源 / 045

第三节 村史 / 052

第四节 村落背景 / 056

第三章 婚姻家庭 / 063

第一节 择偶 / 064

第二节 定亲 / 072

第三节 嫁娶 / 078

第四节 婚居与生育 / 098

第五节 家庭抚育 / 108

第四章 土掌房 / 117

第一节 土掌房的物质形态 / 119

第二节 空间化了的民居文化 / 125

第三节 土掌房的社会功能 / 138

第四节 现代背景下的彝族民居 / 153

第五章 花腰服饰 / 163

第一节 服饰类型 / 165

第二节 服饰部件 / 168

第三节 服饰文化 / 183

第四节 服饰变化 / 192

第六章 祭龙 / 197

第一节 仪式与象征 / 198

第二节 花腰彝祭龙要素 / 204

第三节 祭龙过程 / 216

第四节 祭龙意涵 / 242

第五节 变迁与延续 / 251

第七章 丧葬 / 263

第一节 遇丧 / 265

第二节 布堂 / 267

第三节 奔丧 / 270

第四节 祭堂 / 275

第五节 发丧 / 281

第八章 迈向经济新生活 / 287

第一节 传统的生计方式 / 289

第二节 生业结构变迁 / 297

第四节 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 / 306

参考文献 / 319

附录一：麻栗树村大事记 / 323

附录二：麻栗树村精英人物 / 325

后记 / 333

第一章 || 导论

我们把历史当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处理，而非搜集一些静态的事实就万事大吉。尽管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为其过去所塑造，也仍然必须积极地质疑、修正过去的意义与解释。毕竟，过去往往是通过一些不确定的叙述影响我们的，历史编撰本身并不能充当真理的最终保证，而且，正因为把过去看成是与不断的重新界定息息相关的一个方面，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深入思考一个不确定未来的可能性。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P2.2006）

第一节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村庄

一、争鸣的村庄研究范式

如何在“地方”与整体社会之间找到文化表述的结合点，这是中西方人类学者一开始进行村庄研究就关注的题域。20世纪30年代，西方功能主义倡导的微型村庄研究，经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等人的改造后，本土化为中国社区研究方法，指引着中国民族学者开展村庄调查。然而，也正是这一西引的方法论，使“地方”与“整体社会”成为中西方人类学者更为激烈的争论话语。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在其著《社会人类学》（1982年）一书中，对以英文出版的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四本民族志予以尖刻批评，并以否定性的口吻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自身社会研究能否做到客观？第二，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针对利奇的第二个质疑，费孝通先生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费先生曾以江村为例说道：“中国各地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

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①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他提出“类型比较”的方法，试图以村庄土地制度和产业构成的不同类型的比较，来说明地方村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费孝通先生重点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深信可以用“类型比较”的方法来逐步接近整体社会的全貌。费先生指出：“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②中山大学的麻国庆教授认为：“费孝通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相同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③

中西方人类学者的争鸣声中，中国的村庄研究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特殊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学者从西方人类学界采借的微型村庄社区研究方法被迫放弃，中国的村庄研究一搁置，就是二十多年时间。在这期间，中国人类学者的眼光开始转向少数民族的大规模普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古文献资料，拓展了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多元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第46页，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第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麻国庆：《比较社会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

性和文化多样性视野。而在西方，由于中外人类学理论和实地调查经验交流被切断，西方人类学家失去了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的机会，不得不坐上“摇篮椅”开始“案头”工作，进行遥远的中国想象。但也正是遥远的“中国想象”，使很多海外人类学者更加坚信利奇的中国质疑。他们都认为，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能将时间和空间上与世隔绝的社区当成研究的唯一内容，而应该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与历史进程展开研究。这种理论关怀，在汉学人类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那里表现得最为彻底。1962年，弗里德曼在皇家人类学会上作“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演讲时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以中国文明的本土特征为主线，不能以村庄民族志为模式，以村庄研究的数量来“堆积出”一个中国。他主张综合人类学和汉学关于文明史的研究，来表述中国宏观社会。但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认为：“怎样将这个‘小地方’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的‘宏大叙述’结合起来，弗里德曼本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所幸的是，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村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路径。”^①施坚雅赞同弗里德曼的中国视野，他认为不局限于村庄民族志研究的理由有两方面。首先，中国的村庄向来不是孤立的，且中国社会的基本网络不在村庄而在集市。一般而言，六个村庄形成一个基本的共同体。他将这个基本的共同体“标准集市”。标准集市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元，而且是通婚、地方政治的范围，人们的信仰区域也与集市密切相关；其次，中国的经济实体是由标准集市连接起来的宏观经济区域，这些宏

① 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观区域内部得到一体化，对外关系相对独立，在历史上不仅是经济区域，而且还与行政区划、文化区域重叠。因次，施氏主张，要对中国真正的社会结构有把握的话，必须研究这个标准共同体。他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①

20世纪70年代，尽管“汉学人类学”鼻祖弗里德曼一直“冷落”村庄，但欠于无法找到窥探中国整体社会的窗口，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曾经声称要“抛弃”的中国村庄，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门下的几位弟子派往港台农村社区开展村庄调查。在港台进行田野调查的斐达礼（Hugh-Baker）和芮马丁（Emily Martin Ahern）分别从家庭和祖先祭司角度探讨了香港和台湾家族村庄的社会构成。1974年，武雅士（Arthur Wolf）将这段时期的村庄研究成果统一收编在其主编的《中国社会的仪式与宗族》一书里。1979年，波特夫妇（Sula Mith and Jack Potter）首次来到中国广东。后来，根据多年调查，他们将广东村庄研究中获得资料写成《中国农民》。1983年，黄树民从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到厦门展开对林村调查，时隔六年，他以英文的形式写成著作《林村的故事》。同期，孔迈隆在华北，萧凤霞在广东也进行了调查。事后，萧氏的专著《代理人与受害者》在1989年公开出版。这段时期，武雅士与庄英章合作的大型农村调查计划也在福建有效开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展。中国的村庄民族志调查“消逝”二十多年后，再次恢复原有的地位，村庄民族志调查成为人类学讨论的核心话题。当然，新一代的人类学者在继承前人村庄研究“衣钵”的同时，更加注重村庄与超越村庄的社会关系研究。

二、中国农民的生活

中国人类学视野中的村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全面展开。也可以说，中西方人类学者的争论，也主要针对我国村庄民族志调查而展开的。然而，争论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微型村庄调查，而且在吴文藻先生主倡的社区研究方法的引导下，中国的村庄研究悄悄进入了规范村庄民族志的“早春天气”。1935年，林耀华先生通过对福建义序家族村落调查，撰写并出版了《义序的宗族研究》。林先生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系统呈现出中国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其著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早期典范之作。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人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均得益于吴文藻先生的精心培养。同年，当林耀华先生关注义序宗族时，费孝通先生则偕妻王同惠走上广西大瑶山瑶族地区进行调查。然而在瑶山调查时却发生了悲剧——费孝通先生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因此费孝通先生不得不离开大瑶山，回到家乡江苏省吴江市开弦弓村养伤。期间，他开始了开弦弓村调查。后留学英伦，他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系统整理后，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费先生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关系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搭配的社会整体，从村

落内部的社会结构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给予高度评价说:“我敢预言费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个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①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留英归国的费孝通,召集一大批人类学者群聚云南呈贡“魁星阁”。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1945)、《祖荫之下》(许烺光,1945)、《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1945)等经典民族志著作。费、许、田三人的社区关怀各有不同。费孝通先生特别注重土地问题,许烺光先生则注重礼俗文化,而田汝康先生则特别关注“边民”的生活方式对于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费、许二人都想从“小地方”的描述来透视中国“整体社会”,而田汝康先生关注田野生活中的“他者”,试图从边民的社区生活中,借以洞察主流市场经济模式的仪式形态。“三位前辈都关注到公共仪式在村寨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费先生期待从仪式中看到现代化的轨迹;许先生则认为家族仪式表达的‘大家庭’社会生活方式,不同于现代核心家庭,它可以补充现代核心家庭的心理缺憾;田先生认为公共仪式表述的是一种难得的虔诚,一种对等级社会的内在省思。”^②“这批早期本土人类学家的成就,被国际人类学广泛承认,他们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在写作,曾师承海内外人类学家,调查成果既具有浓厚的‘本土特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序),第13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色’，在学理和方法上又能与先进的国界人类学理论构成对话。他们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①通过村庄研究，他们萌生并践行着一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魁阁精神”。

或因师出同门，费、林二人在吴文藻先生的导引下，始终把“微型社区研究”作为其民族研究的重要方法。抗战爆发，北京高校的学者们向中国大后方转移，林耀华先生也因此有机会到了川、滇、康交界的大小凉山对彝族村寨进行调查。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汇集林先生的调查研究论文及教学书稿，编撰出版《凉山彝家》。林先生分别从区域、氏族、亲属、家族等九个层面的细致描写，为人们真实呈现了凉山罗罗人的生产生活现状。该书出版后，受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先晋女士等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在西方许多大学里，该书还被指定为教学阅读用书。脱手《义序的宗族研究》、《凉山彝家》的林先生并未放松对中国村庄的调查。1944年至1948年四年时间里，林先生一直都在关注福建玉田县黄村农民的生活。1949年，他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问世，为西方学者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画面。

西方民族志调查研究，经吴文藻先生引进中国，再经费孝通、林耀华等著名人类学家的实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土化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引下，中国学者通过中国微型乡村的观察研究，与西方人类学者展开了多种层面的学术对话。当然，除了费孝通和利奇（Edmund-

^① 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